

民国时期对奥古斯丁的译介^{*}

周伟驰

在奥古斯丁的译介上，如果说明清之际是天主教“一家独大”，晚清时新教后来居上，与天主教形成“双峰并峙”之势，那么，民国时期就可以说是天主教、新教和人文学界“三足鼎立”了。本文“绪言”中概述了民国奥古斯丁译介的总体情况，然后分别介绍了天主教、新教和人文学界的奥古斯丁译介成果。

关键词：奥古斯丁（奥斯定） 忏悔录 雷鸣远 巴彼尼

作者 周伟驰，1969年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。

一、绪言

奥古斯丁哲学的汉传，在明末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、利玛窦、艾儒略等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开始了。可以说，在明末清初，奥古斯丁其人是以“圣人传”的形式、奥古斯丁其思是以“语录”的形式呈现给中国读者的。到了晚清，新教传教士林乐知写了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奥古斯丁传记，《忏悔录》也有了两个文言文译本，一个是1884年慕维廉的《古圣任罪》，一个是1909年胡貽谷的《古圣明心》。前者是缩译，后者亦只译了前十卷。

进入民国后，天主教奋起直追，在译介奥古斯丁上成绩超过了新教。先是有雷鸣远《圣奥古斯丁归化史》（1913），堪称“奥古斯丁中国化”的典范，接着有中译的巴彼尼《圣奥斯定传》（1936），前者是极具特色的创作，后者是人名作。天主教还出现了一些白话文的奥古斯丁小传，以陈泗芬编译《八大圣师传略合编》（1925），卜相贤编译《奥斯定》，何慕人译《北非圣师圣奥斯定小传》（1946）为代表。在翻译奥古斯丁著作上，天主教赵允伯翻译了《忏悔录》，新教徐宝谦（1892-1944）翻译了《忏悔录》，邹秉彝（1900-1954）翻译了《上帝之城》，但是这三个白话文译本后来都佚失了，没有得到出版。耶稣会吴应枫（1898-1972）从1948年开始翻译《忏悔录》，两年后在土山湾出版，可谓硕果仅存。

民国时期，新教译介奥古斯丁的主要贡献，仍旧是由广学会做出的。广学会在民国时期出版了《奥古斯丁金言录》（1936），及吴维亚中译的《圣奥古斯丁》（1937）。此外，新教跟天主教一样，在各宗各派编译的教会史著作中，一般都会提及奥古斯丁。

跟明清不同的是，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，他们主要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，一些人开始独立地译介西方历史、文学史和哲学史，有时会涉及奥古斯丁。比如，周作人

* 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奥古斯丁哲学汉传文献整理与研究”（18BZJ027）阶段性成果。本文亦得到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“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”（中山大学）支持。

(1885-1967)《欧洲文学史》(1922)、郑振铎(1898-1958)《文学大纲》(1927)已述及奥古斯丁《忏悔录》。周作人还首次在中国将 confessions 译为“忏悔”。哲学方面,张东荪(1886-1973)、刘伯明(1887-1923)、黄忏华(1890-1977)、李石岑(1892-1934)、瞿世英(1901-1976)、全增嘏(1903-1984)在编译或撰写西方哲学史时,都会论及奥古斯丁。一些西方历史家如余柏威、威伯尔、梯利、马尔文、顾西曼等人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均被译为中文。这类著作侧重于评述奥古斯丁心灵哲学、自由意志、时间理论、历史哲学,而跟教会学者侧重于神学不同,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尤其得到重视。由于译本来源(日本、欧美、苏联)和所受影响不同,著译者对奥古斯丁有不同的评价,呈现显著的差异。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对奥古斯丁的论述,在建国后成为主导模式。

至于奥古斯丁在民国知识界的影响,较显著的例子是在纪念奥古斯丁 1500 年前夕(1930),几个时在上海的文人张若谷、邵洵美、胡乌衣关于 confessions 一词的翻译的讨论。这些讨论收录在张若谷(1905-1960)《咖啡座谈》一书中。^①

1930 年出现了奥古斯丁哲学汉传史的第一个,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学术史回顾,即徐景贤(1907-1946)先生的《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》。该文初刊于 1930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20 日天津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,继在《中华公教青年会季刊》第二卷第 3、4 期转载,后出了单行本。^②徐景贤回顾了利玛窦以来对奥古斯丁的译介,重点在民国时期即他那个时代的情况,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。当然,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,他对于明清之际天主教的译介把握尚不全面,亦未注意到晚清新教的译介(如林乐知《奥古斯丁》)。徐景贤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才能,如果能享有太平岁月,定能推进中国的奥古斯丁研究。可惜其生逢乱世,英年早逝,后继乏人。

曾在法国获博士学位的天主教学者王昌祉(1899-1960),其法文著作《圣奥斯定与异教徒美德》^③在西方颇有影响,代表当时中国奥古斯丁研究的国际水平。他亦曾出版《王阳明的道德哲学》^④,该书被收入上海《汉学丛书》(Varietes Sinologiques)。^⑤可惜王昌祉回国后所撰多为教内小册子,似未有更多奥古斯丁译介,因此在国内反而影响不大。这也跟当时抗战的形势有关。由于战争的影响,民国后期的奥古斯丁译介显著减少。

整个民国时期,虽然“黄金十年”(1927-1937)的荣景在奥古斯丁译介上也有反映,但总体来说,民国时期仍旧是以“译介”为主,纯学术性质的“研究”不多。因此,本文标题“译介”,而不冠名“研究”。大陆严格意义上的奥古斯丁研究,要等到 1978 年“改革开放”以后。下面只拣民国时期较重要的文献介绍。

二、天主教的奥古斯丁译介

在奥古斯丁的译介上,民国时期的天主教,要比晚清时活跃得多。和新教一样,天主教也在

① 张若谷:《咖啡座谈》,上海真美善书局,1929 年。关于《忏悔录》汉语译介史,笔者将有专文论述,此处不赘。

② 徐景贤:《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》,中华公教教学友联合会单行本,1931 年(北大图书馆有藏),或参看赵中亚选编《徐景贤文存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6 年。

③ J. Wang Tch'ang-tche, *Saint Augustin et les Vertus des Paiens*, Paris: Beauchesne, 1938.

④ J. Wang Tch'ang-tche, *La Philosophie Morale de Wang Yang-ming*, Paris: P Geuthner/Changhai: Tou-se-we, 1936.

⑤ 关于《汉学丛书》的情况,可以参看王国强:《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:以〈汉学丛书〉为例》,载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6 年第 6 期,第 140-149 页。王国强仅提到王昌祉的《王阳明的道德哲学》一书,未提到《圣奥斯定与异教徒美德》这部杰作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4期

一般的教会史著作中提及奥古斯丁。不同的是,跟在明清时一样,天主教由于其瞻礼需要,会在圣徒传记中提及奥古斯丁。如1932年土山湾印书馆重印了冯秉正《圣年广益》,1934-1936年兖州天主堂印书馆刊行了艾儒略(此人并非明末艾儒略)的《圣人德表》,里面都在八月廿七、廿八两个瞻礼日讲述莫尼卡和奥古斯丁的事迹。再如《方言圣人行实摘录》^①,就以“圣徒传记”的形式,用上海土话生动地描述了“圣妇莫尼加”的生平事迹。

天主教教会史著作甚多,里面大多会讲到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地位。如赵石经编《新编圣教史纲》^②,于炳南编《圣教会史纲》^③。天主教亦有哲学教程,常守义(?-1991)所著《哲学史缩型》中关于奥古斯丁的论述,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。常守义分“理智界论题”、“事实界论题”和“伦理界论题”进行讨论。其中“伦理界论题”是关于终极幸福的。常守义说:

人的终向既为度福乐的生活,而这福乐的生活当在什么上?

人都怀着享福,而且怀着享永福的盼望;而人所盼望这个大福,应当是何等性质的呢?依必古派^④将这福乐只放在肉身的福乐上,斯多亚派将这福乐只放在精神的福乐上,逍遥学派则将之放在肉身和精神两方的福乐上。这其中连那最好的意见,也不正确,因为他们的通病,都是要在现世找得真福乐。然而“这个现世而有死的生命不是有福的,却是我们应当忍受的一种生活”。为能得到完全的福乐,应当享得天主:“主子,你造作了我们,原是为你,除非安息于你,我们的心总不能得安宁”“赏报德行的,必是创作了德行的”。

所以奥斯定以造物主为人生活的最末终向。人伦理界行为应当遵循的轨道,都须对照此最末的终向,以作规定。奥斯定准此原理讨论的伦理学,当然纯正而齐全。不过欲知奥斯定的伦理学,最好去读天主教会的全部伦理学。

奥斯定不但以每人个体的生活当归向造物主,以造物主作己最末的终向,且以社会国家的终向也当归向造物主,故此社会国家也得遵守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。^⑤

除了教会史著作和神哲学概论中涉及奥古斯丁,天主教在民国时期亦出现了专门讲述奥古斯丁的现代传记作品。1925年陈泗芬出版了其编译的《八大圣师传略合编》。所谓“八大圣师”,即指希腊四大教父加上拉丁四大教父,里面有一章专讲奥古斯丁。这是较早由中国天主教人士自己编译的教父传记,文笔甚为畅达,在读者中流传甚广,影响较大。比如,张若谷、徐景贤等人都在文章中提到此书。陈泗芬在描述奥古斯丁之为人时说:

因此圣人之声名大振,复蒙大主教委任副主教,并定正主教出缺后,由圣人升补。圣人受此荣典,仍谦卑自牧,一如曩日。自奉极菲薄。用膳时,非谈圣论,即令人诵圣书。彼时圣人周旋中礼,人无间然矣。

至于圣人之慈善爱人,周急穷旅,加人一等。无有时,圣物亦出售,以给之。圣人平日不肯论人长短,谓“诽谤如利刃,挥出之,伤三方面也。一,出口伤人者之心。二,受谤者之名誉。三,听者之耳官污矣”。若夫妇女交际,圣人更慎之又慎,即亲如姊妹,近如女姪,亦必疏之。常云:“亲戚妇女,虽无嫌疑,然屡去相会,易招人起疑也。”

圣人每日喜宣讲,非有疾不废。异端邪说,嫉视如仇。口辟笔诛,不遗余力。多数异

① 苗仰山(C. Bortolazzi):《方言圣人行实摘录》,上海土山湾印书馆,1913年,第81-84页。

② 赵石经编《新编圣教史纲》(上册),土山湾印书馆,1938年,第101-102页。

③ 于炳南编,杨堤译《圣教会史纲》(下),土山湾印书馆,1941年,第41-43页。

④ 依必古派,指伊壁鸠鲁派。——笔者注

⑤ 常守义:《哲学史缩型》,西什库遣使会出版发行,1943年,第123-124页。

端，如妈尔甘伍、陶那帝斯^①、贝拉齐亚^②等，几使于斐洲地界，无容足地。圣人之力也。^③

这些内容跟明清天主教“圣人传”一样，主要源自波西迪乌斯的《奥古斯丁生平》。不过，也跟那些“圣人传”一样，里面有一些不准确之处。比如，陈泗芬说莫尼卡担心奥古斯丁误入异端歧途，找到盎博罗削，盎说“此涕泣之子……必不沦亡”。^④其实这句话是另一位主教说的，并非盎说的。

1940年，王昌祉主编的《圣心良友》第一集，共收录中外作者十二篇文章，其中有一篇《圣奥斯定》，撰写者为司铎 E. Reinand。^⑤1946年澳门出了一套“灵修小丛书”，其中有何慕人译《北非圣师圣奥斯定小传》，约一万字，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古斯丁的事迹。^⑥卜相贤等编译了《奥斯定》^⑦，分“青年时代”、“晚年”、“性格”三章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古斯丁生平。以上都是天主教专讲奥古斯丁事迹的小册子。

民国时期天主教译介的主要贡献，尚非以上教会史章节及传记小册，而在于三部长篇著作。一个是吴应枫翻译《忏悔录》，一个是雷鸣远创作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，一个是巴彼尼《圣奥斯定传》的翻译。这里只讲后两部作品。

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于1913-1914刊发于天津《广益录》。据徐景贤说，主创者是雷鸣远(Frederic Lebbe, 1877-1940)。雷鸣远的中文很好，他后来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国籍。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里面有小部分是中国文人杜竹宣创作的，因此夹杂了少量文言。^⑧文章主体以白话文写出，看来是雷鸣远的作用。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用章回体的形式，但语言是白话文，里面的人情世故也颇中国化，考虑到在当时“白话文运动”尚未兴起，这种中国化、本土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语言，尤其可贵。这里我们只看第一回《奥斯丁之世家与家族教育》开头一段，是个如何有趣的写法：

话说罗马皇帝，公斯坦在位的时候，在亚非利加洲的北边，大加斯德城，有一家夫妇二人，丈夫名叫巴提斯，在本城里作一个小官。夫人名叫莫尼加。巴提斯的为人，生性强毅，暴厉非常，每逢发起脾气来，跳燥如雷。你说老虎利害，他敢前去捋须，你说狮子凶猛，他敢前去打牙。巴提斯虽是生就这样一宗横生风波、招灾若祸的性情，然而他这位夫人，可是幽闲贞静，贤惠异常，说话行事，处处可爱。无论亲戚朋友，远街近坊，凡认识他的，没有不交口称赞的。并且这巴提斯夫人，最是笃信天主教，望弥撒，守瞻礼，辨神工，施哀矜，诚恳火热，超过寻常，因此天主赐给他聪明智慧，叫他治家有条，治事不乱。更有一样最奇怪的，是巴提斯虽然生就这样刚厉强暴的皮气，但一见了莫尼加的情形，一听了莫尼加的劝解，就能够风雷卷息，云雾全消，不忍的也忍啦，不耐的也耐啦。看官可要弄明白了，巴提斯并不是有季常之惧，乾刚不振，怕老婆。莫尼加更不是床头夜叉，河东狮子，主持发达女权，奴隶男子，人家乃是以情感义以柔克刚，如常言所说：家有贤妻，男子不作横事。因此夫妻二人，伉俪甚笃。惟有一样美中不足的事，是巴提斯总未奉教。莫尼加为了这件事情，

① 妈尔甘伍，指摩尼教。陶那帝斯，指多纳特派。

② 贝拉齐亚，指佩拉纠派。

③ 陈泗芬编译《八大圣师传略合编》，土山湾印书馆，1925年，第8-9页。

④ 同上，第7页。

⑤ 王昌祉编《圣心良友》第一集，土山湾印书馆，1940年，第89-98页。

⑥ 《露德小花·免疫主何·北非圣师奥斯定小传》，澳门白德美纪念出版社，1946年，三本小册子合订。

⑦ 卜相贤等编译《奥斯定》，出版社及时间不详（可能是1940年代）。国图网“民国图书”可查到。

⑧ 徐景贤：《圣奥斯定与中国学术界》，中华公教学友联合会单行本，1931年，第34、38页；或参《徐景贤文存》，第284、286页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4期

不知费了多少心血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，至终到他丈夫临死的时候，翻然醒省，回头认主，作了天主的信徒，成了莫尼加的心愿，此是后话表过不提。^①

不过，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也有一点问题，那就是出于对莫尼加的崇敬之情，作者多方为其言行辩护，有时过了头就成了曲意维护。比如，莫尼加为了奥古斯丁的前程着想，要他抛弃他儿子的生母，而另与一贵族之女结婚，这无疑体现了莫尼加的世俗心理，但作者（雷鸣远）却添加种种理由，说莫尼加这是为了奥的信仰起见。尽管有这些小缺点，在语言，及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上，却彻彻底底是“中国化”的，堪称奥古斯丁东渐史上的一个典范。

至于巴彼尼的《圣奥斯定传》，则是1936年经上海主教惠（惠济良）^②准后，由土山湾印书馆刊行。该书为“光启杂录”丛书之一，没有登出译者姓名。

巴彼尼（Giovanni Papini, 1881-1956）为意大利著名作家，早期为无神论者，1921年皈依天主教，同年出版《基督故事》（Storia di Cristo），轰动一时，被译成二十三国文字。^③巴彼尼写有大量名人传记，1931年出版《圣奥斯定》（Sant'Agostino）。从行文中时有英文单词来看，土山湾中文版可能是从《圣奥斯定》的英译本译出。

那么，中译者可能是谁？我们暂时找不到。一条有用的线索是，巴彼尼的《基督故事》曾经被翻译成中文，名为《基督传》，译述者为贾立言（A. J. Garnier）和周云路，可能是采取了西人口述、中士笔录的传统翻译方式，该书由上海广学会1929年2月初版，1930年7月再版。书前有贾立言“基督传序”。^④是否有可能贾、周二人翻译了《圣奥斯定传》，不过因为是新教徒，不方便在天主教的土山湾印书馆亮相？当然，也可能是天主教神父、修士和学者（如徐景贤）翻译了此书，但目前尚找不到线索。至于徐景贤，如果他参与了翻译，不会不告知读者的，因为他是学者，不必遵守教会的清规戒律隐姓埋名。徐景贤曾经在1931年介绍过巴彼尼的这本书^⑤，很可能，他作为中华公教学友联合会执行会长和中国圣奥思定学会重要成员^⑥，推荐或找到相关的人员翻译了这本书。从里面的天主教译名来看，译者很可能是天主教信徒或修士。

《圣奥斯定传》大致有9万字。篇幅上已超出林乐知《奥古斯丁》和雷鸣远《圣奥斯丁归化史》，创造了一个纪录。大致要到1987年Henry Chadwick的《奥古斯丁》（黄秀慧译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）、1992年蒙哥马利的《奥古斯丁》（于海、王晓平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出版，在篇幅上才被超过。

《圣奥斯定传》共有二十九章。其中前面二十一章主要根据《忏悔录》来讲述奥古斯丁前半生的生平故事，从第二十二章起，开始讲述莫尼卡死后，他返回罗马、再回到非洲创立修会、晋升主教、热心教务及参与各方论战的故事。最后一章“伟大人格”，对奥古斯丁推崇备至，认为他跟前后大多数的哲学家、神学家相比，都更为全面、中和：

在奥斯定身上，什么也不缺少，他是个全人，是个应有尽有的人，一点缺憾也没有。他不但是一个人，也是一个超人，熟谙着天主事理。这不是因为奥斯定是个诗人、演说家、心理学家、哲学家、神学家和神秘者，却是因为他能把所有使大多数发生困难、错误、冲突的一切互相矛盾的心情集合在他一人身上，却又能调和匀和，研究出一种更高妙的真理。^⑦

① 《广益录》第78号（1913年8月24日），第430-431页。

② 惠济良（Auguste Alphonse Pierre Haouisée S. J., 1877-1948），法国耶稣会会士，1903年来华。1933-1947年任上海代牧区主教，1947-1948年任上海教区主教。1948年9月病逝于上海。

③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Giovanni_Papini（2018年6月7日）。

④ 参见《民国时期总书目/宗教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4年。《基督传》编号为3999。

⑤ 徐景贤：《公教与文学》，载《徐景贤文存》，第414-422页。

⑥ 中国圣奥思定学会的成立，参见《徐景贤文存》，第303页。

⑦ 《圣奥斯定传》，土山湾印书馆，1936年，第282页；或《圣奥斯定传》，河北信德室，2000年，第183页。

三、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

民国期间,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相对分散,散见于各教派的教会史译著中,比如赫士《教会历史》^①,沙穆原《教会历史》^②,石约翰、高果能著《教会辑史》^③,贾立言编《基督教史纲》^④,J. W. Nichols《基督教会史略》^⑤,穆格新《教会史略》^⑥,卞文《基督教史略》^⑦,林仰山《教会史》^⑧,华尔克《基督教会史》^⑨等等。新教派别及差会众多,因此不像天主教那样有相对统一的写法,总体来说,新教判教色彩较重,各人水平差距较大。在介绍的详细程度上,以华尔克《基督教会史》(第一卷)为佳。该书是权威的教会史著作,在1991年尚有重译本。^⑩

新教的教会史著作中,亦不乏不准确的作品。比如,盖温柔《教会历史》本是盖温柔1934年下半年在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讲课笔记,1935年起各章陆续印出,1947年印出全本。可能是由于笔记不全的原因,里面关于奥古斯丁的部分,错误甚多。

安波洛兹平时常帮助奥古斯丁明白圣经。当奥古斯丁年三十三岁的时候,在他母亲将死以前,他悔改重生了,使他母亲快乐无穷。奥古斯丁重生以后得到大平安,就退到旷野退修了三年,三年以后教会请他当监督的职司。他同时就将自己完全奉献,他很有钱财,将财产全捐给教会,并且往各处游行布道,竭力反对或更正邪教一切的说法,因此很多人受感悔改,齐心脱离邪教而跟从主。他也写了很多书,如《神学》、《神的理论》、《哲学》……他的书在以后大大帮助了诺克斯、马丁路得、喀尔文等人。奥古斯丁最出名的一本著作名为《神的城》(City of God),其大旨论(1)罪、(2)地狱、(3)天堂、(4)基督的十字架、(5)世界的城单靠人的智慧能干,神的城乃真信徒组织而成的……^⑪

其实,帮助奥古斯丁明白圣经的更多是辛普里西安。奥古斯丁在家乡隐居三年,并非在旷野,他不是埃及沙漠教父。他的财产也不太多,他并非埃及圣安东尼那样的财主。他常年主持希坡教务,只是在需要时才到外地开会,并非游方大和尚。他当然没有写过《神学》《哲学》这样的教科书。至于《上帝之城》的内容,也不像盖温柔概括的这么大而化之。总之,盖温柔讲课未免太随意了。书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有很多。

在民国时期,开始出现中国基督徒自己撰写、编译的基督教会史,里面也会涉及到奥古斯丁。如谢颂羔(1895-1974)《基督教思想进步小史》里是这样写的:

他(奥古斯丁)以为:(一)人们的为善或为恶,其意志都是自由的,就是为善为恶,都由人自己决定;但是他又以为(二)人类能得救的,虽犯过极重大的罪,终必依然得救,

① 赫士:《教会历史》,广学会,1914年初版,第64、66、72页。

② 沙穆原:《教会历史》,瑞思义、许家惺译述,广学会,1914年,第45-50页。

③ 石约翰、高果能:《教会辑史》,湖南信义会,1917年,第62-66页。该书英文内封显示作者为 Jaakko Gummerus, V. T. Rosenqvist, 译为 Hannes Sjoblom, Kalle Korhonen。故该书中文封面有误,应为石约翰、高果能“译”,而不是“著”。

④ 贾立言(A. J. Garnier)编,冯雪冰译述《基督教史纲》,广学会,1928年(初版),第139-143页。

⑤ 蔡振华译《基督教会史略》(再版),中华圣公会书籍委办,1932年,第62-65页。

⑥ 穆格新(Sten Bugge):《教会史略》,中华信义会书报部,1933年,第44-49页。

⑦ 卞文(E. Bevan)著,郑启中译《基督教史略》,青年协会书局,1937年,第67-70、74-75页。

⑧ 林仰山(F. S. Drake):《教会史》(第一卷),广学会,1940年,第217-223页。

⑨ 华尔克(Williston Walker)著,谢受灵译《基督教会史》,广学会,1948年,第262-284页。

⑩ 威廉斯顿·沃尔克著,孙善玲、段琦译《基督教会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1年。

⑪ 盖温柔讲,赵世光记《教会历史》,香港灵粮刊社,1947年,第30页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4期

而不能得救的，终必灭亡，因为这都是上帝所预定的。这两种论调，实在是自相矛盾的；但是他的预定论，却使后世的教会受着很大的影响。他以为人的得救，乃是靠着上帝的恩惠，这种观念，实为正当，无可非议。奥氏的人生观，颇抱悲观，因为他觉得现世不过是暂时的，人们的得救，乃是在将来的世界中。他也很相信梦兆，相信行奇迹，甚至于相信用为道牺牲之使徒司提反的骸骨，可以治病，这或者也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尚未发达，所以才有这许多迷信的谬误思想。^①

谢颂羔在广学会工作，他做翻译的方式是广学会传统的“译述”，即由他口译，由助手笔述。据说，他翻译得比较随意（如译《天路历程》），就只求译出大意，自由发挥较多。^②这可能是继承了李提摩太“但求精义，不拘字义”的翻译精神。应该说，就他对奥古斯丁思想中矛盾和保守的揭示来看，他的翻译还是比较准确的。

中国的神学家在谈论神学时，自然也绕不过奥古斯丁。齐鲁的彭彼得在1936年出版的《基督教思想史》^③和《基督教义诠释》^④两本书里都谈到了奥古斯丁。著名神学家赵紫宸在谈到上帝住在人之内，人便成为中心时，引用奥古斯丁“上帝似圈，其中点无不在，其边际无所不在”^⑤。在谈到人易受诱惑走入歧途时，他举奥古斯丁为例：

但是战胜试诱，谈何容易。人的才智愈大，他所受的试探亦愈厉害，而其颠扑也亦愈重，其昏迷也亦愈甚。譬如圣奥古斯丁，在少年的时代，桀骜不羁，倜傥自许，一方面发展嚣张的才气，一方面肆行他不守轨范的恋爱。“九年之久”，他说：“我生活在各种肉欲之中，被引诱而引诱人，被哄骗而哄骗人。”后来，收心改性，做了基督徒，深深地觉悟到只有信赖上帝，才得从恍惚迷离的堕落中抬起头来。^⑥

相比于天主教，民国时期新教专门的奥古斯丁译介不多。广学会出版的《圣奥古斯丁》是篇幅较长的一本。^⑦该著前面的章节依据《忏悔录》，将奥古斯丁早年的生活详细讲述了一番，最后用了三章来讲奥古斯丁后来的事：“黑坡主教”、“奥古斯丁的忏悔录”、“暮年”。同一年，广学会亦出版了一本讲奥古斯丁母亲莫尼卡的书《伟人的母亲》（圣穆奈加）^⑧，大概是为了与《圣奥古斯丁》一书配套。

虽然在单独译介奥古斯丁上远不如天主教，但新教在翻译奥古斯丁语录上扳回了一局。1936年，英雅各编译了《奥古斯丁金言录》，可以视为奥古斯丁语录的一个汇总。我们知道，明末清初奥古斯丁思想主要通过天主教人士引用奥古斯丁“金句”而传播，而《奥古斯丁金言录》则可以视为一本“奥古斯丁语录大全”。编译者在“自序”里说：

从耶稣使徒以后，直到路德改教以前，在教会历史中，最负声誉的人物，当首推圣奥古斯丁。其主要原因有二：（一）他从幼年时代，就陷身罪恶里；但是他最使人景仰的地方，就在能和私欲奋斗，胜恶成圣。他生平的事迹，曾详细载在他所作的忏悔录中。（二）由他

- ① 谢颂羔：《基督教思想进步小史》，广学会，1929年，第12-13页。（可参见王美秀编《东传福音》，黄山书社，2005年，页码为：基21，第198-199页）
- ② 江文汉：《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》，载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四十三辑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，第33页。
- ③ 彭彼得（Peter P'eng）：《基督教思想史》，广学会，1936年，第196-211页。
- ④ 彭彼得：《基督教义诠释》，广学会，1936年，第193-195页。
- ⑤ 赵紫宸：《〈圣经〉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》（1920年），《赵紫宸文集》第三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07年，第70页。
- ⑥ 赵紫宸：《学仁》（1936），《赵紫宸文集》第一卷，商务印书馆，2003年，第385页。
- ⑦ A. Shirley 著，吴维亚译述，《圣奥古斯丁》，广学会，1937年。
- ⑧ Elspeth Procter 著，吴维亚译述《伟人的母亲》（圣穆奈加），广学会，1937年。原书名为：Saint Monnica.

超越的天才，能彻悟圣道的奥妙。虽然他著作之富，几乎无人能够全读；并且多讨论些当时的问题，似与现代无关。然其中多有宗教经验最深刻的言论，并随在发挥他真挚热烈的情感。就是他的片言只句，流传世间，人也看作最可宝贵的珍珠。吾人欲知主后四百年间教会的情况，试一读奥氏的遗书，如在光天净几间，披览逼肖的写真，当年的姿态，确是历历在目。

本书的编译，是由德国哈尔那克（Harnack）的著作中节录下来的。此外为求阅者明了原委起见，由编译者根据历史上的事实，附带加些按语；但正文中所有的名词与语义，唯求与奥氏拉丁文的原书相吻合；既可存真，且足表示从事的慎重。^①

出版者在扉页广告中亦说：“本书编译者根据德国哈尔那克所著的五五七条中选录一半，复经增编百条，大部由拉丁文译成华文。”

全书中文有四万多字，共分十六章，收奥古斯丁语录 371 条。其中前三章主要是奥古斯丁自述其生平，以及其浪子回头的经历，第四章讲奥古斯丁个人品德，其余十二章是奥古斯丁论圣经、上帝、基督、罪恶、信仰、爱心、人道、教会、国家、圣礼、死与天堂、重要学识。基本囊括了新教认为的各个重要方面。与天主教作者在著作中零散地引用奥古斯丁金句相比，无疑这本书要集中得多。但是，与天主教相比，在一些句子的翻译上则显得不够精炼，这也许是因为它是用白话文译的。

从以上出版情况可看出，民国时期新教的奥古斯丁译介，仍旧是由广学会起主要作用。

四、学界的奥古斯丁译介

目前所见最早的学术著作中提及奥古斯丁的，是宣统元年（1909）出版的日本学者本多浅治郎《西洋历史》。书名前有“高等教科参考通用”字样，表明是用来作为新式学堂的历史教材参考书的。当时，能直接读西方文字的中国人不多，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人的相关教材和著作，不愧是一个简捷速效的途径。《西洋历史》用了三两句来介绍奥古斯丁：

奥古斯丁，纪元三百五十四年至四百三十年，亦以拉丁语著述之神学者（Latin Theologian），所作甚富。而《神之都》（City of God）尤为特有之书也。^②

进入民国后，现代大学的学科制逐渐建立和完善，中国学者开始自己编写大学教材和撰写概论性质的西洋文学史、哲学史、历史。1918 年，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出版，里面用了几句话提到奥古斯丁：

St. Augustinus (354-430) 生于 Numidia，少时放逸不羁，偶读圣保罗书，遂改行，归基督教，后进职至主教。作《忏悔录》（Confessiones），述少时情事极美妙，为自叙（Autobiographia）类中杰作，不仅以宗教得名也。^③

以笔者所见，周作人是最早将 Confessiones 译为中文“忏悔录”的人。后来者一般沿用此译，如郑振铎《文学大纲》。^④

在西方，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一般是在神学院和哲学系进行的。在中国，教会系统的奥古斯丁

① 英雅各（James W. Inglis）编译《奥古斯丁金言录》，广学会，1936 年，第 5-6 页。英雅各曾任沈阳东北神学院院长，亦曾与韩汝霖合作译述《遵主圣范》，广学会，1937 年。

② 本多浅治郎著，中国百城书舍编译《西洋历史》，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，宣统二年（1910）再版，第 130 页。

③ 周作人：《欧洲文学史》（第二卷），商务印书馆，1918 年，第 61 页。在第三卷第 50 页，周亦将卢梭的 Confession 译作“忏悔录”。

④ 郑振铎：《文学大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7 年，第 10 页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4期

译介持续存在,但“哲学系”却是一件新鲜事,这跟学习日本有关。1877年日本设立东京大学,其文学部设立了史学哲学政治学科,“哲学”开始成为与“理学”(science)相异的学科。东京大学于1881年设置了独立的“哲学科”。日本学者将“哲学”概念普遍化(“哲学”创译者西周的本意是指与日本国学、儒学不同的西方学问),认为东方也有“哲学”,从而将“哲学”科目分为“西洋哲学”和“东洋哲学”两部分,“东洋哲学”以“支那哲学”和“印度哲学”为主。^①日本的“哲学”观念和学科设置影响了中国学者和留日学生。1914年北京大学创设“中国哲学门”,“哲学”正式进入了学制体系。1916-1919年,中国开始出现“中国哲学史”一类的著作,如谢无量《中国哲学史》、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等。与此同时,中国人编、译、撰的“西洋哲学史”也开始涌现。留日学生因较早接触“西洋哲学史”,其经日文转译的成果也较早出现。随着留学欧美者的回国,就出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。

黄忏华是最早从日文转译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之一,其《西洋哲学史》中抓住“自由与恩典”“我疑故我在”来说奥古斯丁的哲学要点:

解决神性论的问题底,是尼恺亚会议(325)底结果所生,所谓三位一体底信条。基督论的问题底解答,是伊匪苏(Ephesus, 431)会议所定,所谓神人底信条。人性论的问题底解答,是奥古斯丁(Augustinus, 354-430)所决定,所谓原罪底信条。……奥古斯丁,解决第三种信条,说人原来是自由底,人底行为,由这种自由意志发生,所以人不可不向这个负责任。然而人类底始祖亚当(Adam),滥用这种自由去犯罪恶,所以人类丧失这种自由。人类是亚当底子孙,都继承他底性质,在不得不犯罪恶底奴隶状态。人是生来有罪过底——原罪底信条。因此:人无论如何好法,也没有值得救济底功劳,要求救济底权利。神派送救济者来救济人,是神底恩典——神恩说。基督是救世主,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济,基督死,死而复活,复活而升天;从此以后,他底代理者所谓教会,继承他底救济事业;除掉教会,没有救济底路子。

奥古斯丁,在是神学者底一方面,像这样辩护教会,同时企图由自意识,自家检讨去说明认识。他起初相信亚克特美派底怀疑说,后来疑惑起他来,论断所谓怀疑,纵然是真理;然而所谓我疑惑,不是不可以疑惑底事实么?我既然疑惑,那么:我底存在就是事实。我既然存在,那么:我底感性我底理性,也不可以不是确实。我由我底理性,认识现象以上底真理,神就是这个。那么:神也不可以不存在。神是精神底太阳,由神底光,认识他人同外物。一切底原型,在是那个观念底一方面,在神里头。所以认识可以说是了结在自己和神底认识当中。他拿自意识自家检讨做哲学底出发点,于是产生出一种新机轴。拿自意识同自家检讨(反省)做哲学底出发点,实在从他开始。这里应当注意底,是他一方面是神学者,拿教会做中心去拥护信仰,一方面是哲学者,拿自意识做中心去说明一切;因此:他底学说,有两个中心点,结果:把自由解释出许多底意义来,勉强去结合自由说和必然说;重视所谓人类底普遍,又重视自意识底主体,就是个体;勉强去结合普遍论和个体论。贯通中世哲学底全体,相争不下底两种立脚地,可以说是到他于是勉强结合在一种体系下面。^②

后来,黄忏华亦出版《西洋哲学史纲》,表达了与此类似的思想。^③

曾在东京大学哲学系留学的张东荪,亦出版了《西洋哲学史ABC》。他着重强调奥古斯丁“我疑故我在”是笛卡儿“我思故我在”的先驱:

第一是奥古斯丁(Aurelius Augustine, 354-430)。他的著述很多。他的学说算不成系

① 桑兵等: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》,经济科学出版社,2013年,第214-215页。

② 黄忏华编《西洋哲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23年,第81-84页。

③ 黄忏华:《西洋哲学史纲》,商务印书馆,1937年,第101-102页。

统，然而却于后世以很大的影响。他先从怀疑入手，以为纵使一切是可疑，而从事于怀疑的我（即自心）必不可疑。这一点即是近世笛卡儿（Descartes）的所谓“我思故我在”。他以为凡是怀疑即是向真理探求，必是预设有真理自然存在。可惜他说到此便折向宗教方面去。以为永终不变的真理即是神。于是即投入于神学的范围内了。^①

与教界“教会史”写作侧重于奥古斯丁的神学论争不同，“西洋哲学史”侧重于奥古斯丁哲学性的一面，因此，自由意志与预定论的矛盾、自我确定性、时间理论、社会政治观、历史哲学，就成了奥古斯丁“哲学”的主要内容。洪涛《西洋哲学》^②，全增嘏（1903 - 1984）《西洋哲学小史》^③，李石岑（1892 - 1934）^④，刘伯明（1887 - 1923）^⑤谈到奥古斯丁时，都不脱这样的范围。

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樊炳清（1877 - 1929），其晚年独立编译的《哲学辞典》，可谓出类拔萃。关于奥古斯丁，只用了寥寥数句，就准确地囊括了其核心思想：

是时宗教家异论方滋，奥古斯丁屡著书辨难之，卷帙甚繁。最著名于后世者，（一）为《忏悔》（Confessions）自传也。（一）为《神之都》（City of God）言罗马国家虽亡，而基督教不亡，所以慰众心也。其学说，盖有特征数端。（一）为宿罪说，以为人类之祖亚当，滥用其自由，而犯罪恶，故其子孙，传此性质。积罪即深，不能自救。救济之途，惟有信仰基督。（二）为预定说，谓人不独无救济之力，并无要求救济之权。神之遣救济者以救济人，全出自神之恩宠，故又称神宠说。（三）为定命论。谓神为绝对之意志。神从虚无中，创造世界。其为创也，不间不绝，故万有自神预定之。故世无积极的之不善，云不善者，是指自高向下之意志。（四）为主意说。谓人间精神之实体，从三方面发现。曰“有”曰“知”曰“志”，以此拟诸三位一体。而又谓认识事物者，由意志作用使然。夫既否认意志之自由矣，自不得不举一切精神活动之根原，归诸天启。故彼之学说中，尤以“自检讨”一语，为根本原理，（五）其贯通哲学与神学之枢纽，即存乎斯。详言之，即于哲学方面，以自认识为基址，从而分析精神各要素，加以说明，于神学方面，则谓对神而认识之，又从而信之爱之，此乃得自内的经验者，是也。^⑥

如果说“我疑故我在”、自由意志问题还比较形而上，与现实抽离，那么，在民国纷乱的历史情境中，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观和历史哲学引起的关注就比较多了。

朱谦之（1899 - 1972）在1926年写了《历史哲学》，谈及中世纪历史观时，他说：

欧洲中世纪的历史，是完全受宗教支配的。他们从宗教的立脚点，观察历史和宇宙，以为历史这个东西，是一篇神诗（Divine epic），从创造人类起，到赎罪为宇宙剧的末场止。如格罗细士（Gnosis）派就是好例。他说：宇宙的历史的过程，就是善力与恶力争斗，这种争斗只能由基督去救济，救济的结果，以善为最后的胜利。这种历史哲学以基督救世为中心，实在就是历史哲学的渊源了。后来教父奥古斯丁（Augustine, 354 - 430）著了一本《上帝之城》（City of God）证明人类纯然是神的计划，这本书里发挥一种历史哲学，表明上帝之城不在地上是在天上，从《旧约全书》一直述到《新约全书》，都可证明他的存在；在地上的是撒但之城（City of Satan），从亚当犯罪起，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止都是。这么一

① 张东荪：《西洋哲学史 ABC》，世界书局，1930年，第93页；另张东荪亦有《哲学》一书（世界书局，1931年），里面重复了这段讲法，参见该书第169页。

② 洪涛：《西洋哲学史》，上海广益书局，1933年，第50页。

③ 全增嘏：《西洋哲学小史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4年，第30 - 31页。

④ 李石岑：《西洋哲学》，三民书局，1965年，第93页。

⑤ 刘伯明：《西洋古代中世哲学史大纲》，中华书局，1922年，第157 - 161页。

⑥ 樊炳清：《哲学辞典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6年，第748 - 750页。

《世界宗教研究》2018年第4期

来,历史完全变成功^①一部神秘史,而人们所要作的,也只有尽力于建神的城于地上罢了。以后奥古斯丁的弟子 Orosius 把这种思想更推到极端,以为历史就是上帝罚恶的记载,他著了七卷《反对异端的历史》(History directed against the Pagans),举许多古代史中战争和别的恐怖事件,汇在一起,以为这就是基督教没有出世以前的罪恶史了。这部书跟着中世纪基督教的发达,差不多影响有一千年之久。^②

雷岱尔(Harry W. Laidler)著,郑学稼译的《社会主义思想》,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的古代渊源,将奥古斯丁当作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来源。^③ 绍特韦尔(James T. Shotwell)著,何炳松、郭斌佳译《西洋史学史》,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,再到唯物一元论斗争史观的演变线索。^④

拉波播尔(Charles Rappoport)《作为进化科学底历史哲学》,是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书,1930年由青锐^⑤译为中文,书里说历史神学是由奥古斯丁创立的,但它只是一种“冒称的历史哲学”,并非科学。^⑥ 数年后翦伯赞出版的《历史哲学教程》,很明显受到了拉波播尔这本《作为进化科学底的历史哲学》的影响:

基督教的全统治时代,整个的历史研究,都被独断的教义所支配。他们以为人类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,他们用宗教与信仰来迷惑人民,用天国与上帝来欺骗人民,企图蒙蔽他们去认识现实世界,现实生活现实的物质利益。……这样历史上之人类的阶级实践完全用“上帝”二字,抹杀殆尽了。后来的一切观念论者,都是从神学中发展起来的,他们与神学不同的,不过是把“上帝”用“理性”一类的名词代替了。^⑦

米丁等人编著的《辩证法唯物论辞典》,对奥古斯丁“历史哲学”的阶级实质做出了论断:

他想用基督教的教理,尤其是它的反动的本质,做他的学说的基础,这在他的国家学说中最看得明白。他说社会的历史,是神的世界和恶魔的世界的斗争。在这斗争之中,担任最重要的任务的,是基督教教会,人们离开了教会,就不能得救。^⑧

对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类似判断,亦见于一些教科书和辞典。如1949年,薛格洛夫编,王子野译的《西洋哲学史简编》^⑨;胡明编的《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》。^⑩ 这成为1949年后介绍奥古斯丁的主导模式。

(责任编辑:袁朝晖)

① 原文如此。“功”疑为“了”。——笔者

② 朱谦之:《历史哲学》,泰东图书局,1926年,第33-35页。

③ 雷岱尔著,郑学稼译《社会主义思想》,上海黎明书局,1933年,第9-10页。

④ 绍特韦尔著,何炳松、郭斌佳译《西洋史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361-362、375-377、382-384页。

⑤ 青锐即叶青,本名任卓宣。参见黄蕾:《拨开迷雾见真伪——试析青锐其人其说》,《安徽史学》2012年第5期。

⑥ 拉波播尔著,青锐译《作为进化科学底历史哲学》,上海辛垦书店,1935年版,第92-93页。

⑦ 翦伯赞:《历史哲学教程》,新知书店(重庆、上海),1938年,第72-73页。

⑧ 米丁等编著,平生等翻译《辩证法唯物论辞典》,读书生活出版社,1946年再版,第281-282页。(1939年1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初版。)

⑨ 薛格洛夫编,王子野译《西洋哲学史简编》,上海新华书店,1949年,第77-79页。

⑩ 胡明编《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》,光华出版社,1949年,第553-554页。